

中國大陸地區蔣介石研究的新趨向

陳紅民

自《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刊出“‘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筆談”後，中國大陸地區的蔣介石研究出現了一些新的趨向。毋庸諱言，對於蔣介石相關課題的學術研究，有其特殊性，該課題的進展除受一般史學研究規律的制約外，受內外環境影響比其他歷史課題尤大。

以下，先列舉2014年以來與大陸地區蔣介石研究有關的幾個事項。

1.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蔣介石資料數據庫建設”立項。2015年11月，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公佈了當年的重大招標項目，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獲得了“蔣介石資料數據庫建設”項目。這是國家層面上首次為蔣介石研究公開立項，標誌著相關研究進入了新階段。項目的目標是建設一個資料完備、內容豐富、使用便捷的蔣介石資料大型綜合數據庫。

數據庫將涵蓋目前所有允許（包括政策法規與著作權）收錄的關於蔣介石生平事蹟與思想言論的文獻資料，包括蔣介石個人的著作、演講和檔案文件等；關於蔣介石行跡的報導與評論；他人對蔣氏的觀察和評論；蔣介石研究的各類成果等。將涵蓋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和國外藏有蔣氏資料的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紀念館、故居等，爭取不留死角，完成後向全球學界開放。項目組得到各方的大力支持，成員正努力工作，進展順利。

2016年12月10日，由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浙江省檔案學會和浙江大學圖書館主辦的“蔣介石資料整理與研究”研討會在浙江大學召開。來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浙江省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等單位的30餘名專家學者與會。這是學術界首次召開的蔣介石研究史料專題學術會議，集中了大陸地區檔案界、圖書館界、出版界和史學界的重要學者，大家交流了各自館藏檔案與圖書中與蔣介石相關的資料，介紹了其價值、整理與研究情況，並均表示願意合作。

2. 蔣介石日記出版與蔣經國日記開放的延宕。蔣介石家屬蔣方智怡女士把蔣介石日記、蔣經國日記移存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蔣介石日記經過技術處理後，自2006年起對外開放，由此引發了全球學者對蔣介石研究的興趣，這是蔣介石研究學術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它對於推動相關研究的重要性，怎麼估計都不算過分。胡佛研究所檔案館的公開性值得稱道，然而，對於大多數中國學者而言，赴萬里之外的美國查閱檔案畢竟有諸多不便，能將蔣介石日記公開印製出版，成為學界的共同願望。台北中研院已組織力量將蔣日記全部用打字錄入，擬陸續公開出版。至2010年底，已印製了5年的蔣介石日記。但就在發佈之前，蔣氏家族中有成員對日記的

出版提出異議，家屬間的爭議導致蔣介石日記出版與蔣經國日記開放進程的中斷，並演變成一場複雜的官司，短時間難見分曉。所幸，2015年10月，台灣“抗戰歷史文獻研究會”製作了蔣介石在1937～1945年間九年日記的光盤，使得部分學者有了利用的可能。

3. 2015年銀泰公益基金會“因敬仰鄉賢、感恩鄉梓，亦為探尋歷史、弘揚學術”，發起了“蔣氏家族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計劃”學術公益項目。該研究計劃表示，將遵循學術規範，長期支持和資助相關領域的創新性學術研究、學術成果的出版與傳播，推動本領域的學術發展，以期產生持續的成果和長遠的影響。第一期資助計劃為五年（2015～2019），包括資助首席專家、青年學者研究項目與出版、建立青年學者研習營、口述歷史等項目。2015年10月，由知名學者組成的項目學術委員會建立。次年7月，首期“蔣氏家族與中國近現代史青年學者研習營”成功舉行，蔣介石研究領域的7位資深學者對2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營員進行了為期一周的培訓。

銀泰公益基金會資助蔣氏家族相關研究，表現出大陸民間企業家敏銳的洞察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決斷。此外，浙江恒勵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決定對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進行第二期的研究資助，支持中心的發展。

4. 台北“國史館”檔案禁止大陸學者查閱。2016年5月民進黨在台灣上臺執政，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致使兩岸關係大幅度倒退。與此同時，民進黨對國民黨實行清算，蔣介石首當其衝，“去蔣化”與“污蔣化”日趨嚴重。民國檔案的重要典藏單位台北“國史館”突然宣佈，自2016年8月1日起，包括“蔣介石檔案”在內的所有檔案不再對大陸人士開放，台灣人士及外國人查閱也要採取“審查預約制”。同時，對“蔣介石檔案”等要進行“保密”等級的審查，確認不“涉密”始可查閱。此一規定，嚴重違背全世界檔案逐漸公開、自由閱覽的潮流，鉗制“學術自由”。台灣“一群關心及捍衛學術自由的學術人”發起“捍衛學術自由·反對閱覽新制”的全球學者連署活動，美國、英國、日本等全球近千位學者、學生與社會人士踴躍簽名。與此同時，大陸的張憲文、楊天石等著名學者也發起支持台灣學者“捍衛學術自由·反對閱覽新制”的微信連署活動，48小時內即有400餘位歷史學者與研究生簽名。起初，“國史館”方面對於這些抗議活動置若罔聞。進入2017年，“國史館”宣佈，約5萬件“蔣介石檔案”將於1月5日起上線，可以網上查閱。另外的部分在通過“解密審查”後逐步上線，估計約有26萬件。這些“蔣介石檔案”因為是上網公開，所以大陸及港澳地區的讀者也可以閱讀，不受限制。對於事態的發展，學界拭目以待。

台灣另一個典藏民國史檔案的重要機構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也因民進黨當局“清查黨產”致經費困絀，被迫壓縮開放時間。

兩岸關係的倒退，必然導致兩岸學術交流的減少，島內“台獨”聲浪的高漲，也使蔣介石學術研究的環境趨於惡化，將直接遏制蔣介石研究的發展。

5. 梁柱、楊天石之爭。2014年4月23日，《中國社會科學報》刊發北京大學原副校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題為《歷史虛無主義“重寫歷史”有何訴求？》的訪談錄。梁柱對時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表現形式及其危害談了自己的看法，在談到當前“翻案”、“重評”之風大行其道等問題時，特意點到了蔣介石的有關研究。6月23日，《經濟觀察報》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的文章《我為何成了歷史虛無主義的代表》，認為梁柱前文是將其視為當前“翻案”、“重評”之風和“歷史虛無主義”的典型，由此提出質疑，並對梁柱進行反批評。9月5日，梁柱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再談蔣介石

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答楊天石研究員》一文，回應了楊天石的批評。這場爭論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11月24日的《中國社會科學報》“爭鳴”版同時刊登楊天石的《“修辭立其誠”，批判要有根據——再答梁柱教授》和梁柱的《奉勸走出歷史虛無主義的研究誤區——再答楊天石先生》，作為討論的“階段性總結”。

作為首刊梁柱訪談、挑起這場楊天石研究蔣介石的成果是否屬於“歷史虛無主義”論戰的《中國社會科學報》，同時刊出爭論雙方的文章，以表明其不偏不倚的立場。然而，論辯雙方在最後的文章仍是“火藥味”十足，認知差距並未有任何縮小。

二

在2014年的“‘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筆談”中，筆者曾回顧學術史，歸納出制約蔣介石學術研究的主要因素，包括中國大陸自身的社會發展、執政黨的主流意識形態對史學研究的影響、史學界研究觀念的變化、兩岸關係的演變、學術交流與史料的開放程度等。其中，尤以學者所身處的社會環境為甚。近年來大陸地區蔣介石研究的發展，印證了這個歸納大致不錯。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蔣介石相關的學術研究有個十年左右的“快速發展期”，表現為學界關注、學者投入、史料開放、交流頻繁與成果推出，稱“蔣介石研究熱”大概不為過。依一般學術規律，任何一個課題都很難保持長久的“熱度”，蔣介石研究本將進入平穩發展的時期。未來的幾年，這個課題大約要在一個較平穩的層次上行走一段時間。

大環境的改變，作為個體的學者通常無可奈何。學者能做的，就是要滿懷信心，修煉內功，提高研究能力，以更勤勉之精神，辛勤耕作。個人認為，以下兩點是切實可行的：

1. 蒐集資料，擴大蔣介石研究的基礎。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史學史表明，新史料的出現，不僅為研究提供了新的證據，匡正過往的謬誤，而且可能催生新的研究課題與新的方法論。蔣介石研究的一度“井噴”，直接的觸因不能不歸功於台北“國史館”蔣介石檔案與胡佛研究所“蔣介石日記”的開放。十多年過去，利用蔣介石檔案與日記研究的成果已相當多，甚至出現了“審美疲勞”，這是目前蔣介石研究遇到的“瓶頸”之一。其實，蔣介石檔案與日記之外的蔣介石資料數量浩大，種類繁多，分佈亦廣。如果能進行全面蒐集整理，建成數據庫，相信會有助於推進研究。有鑑於此，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目前承擔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蔣介石資料數據庫建設”，就是要將典藏於全球各地的資料蒐集齊全，建成蔣介石檔案與日記之外的第三個蔣介石資料中心，正可彌補“國史館”對大陸學者封鎖與蔣日記暫時不能出版造成的困境。目前，項目組成員不時有“驚喜”發現，如在中華書局找到了《蔣介石言論集》的初稿，這是1960年代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人民出版社、中華書局負責編輯的，收文期限截止到1965年，計劃編40冊1,200萬字，準備“內部出版”，但前4冊送審報批之時，“文革”爆發，再無下文。“言論集”選擇的都是蔣介石言論的最初版本，其史料價值不可低估。

此外，在前文提及的“蔣介石資料整理與研究”研討會上，與會人士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檔案與資料線索。如浙江省東陽市檔案館藏有一批蔣介石的手跡；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日本“滿鐵資料”中，居然也有大量其所收集的蔣介石情報。

2. 拓展視野，發掘新課題。作為中國近代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蔣介石有“公”與“私”兩面。所謂“公”領域，是指蔣擔任公職時的言論與行動，及其所產生的影響，通常是對中國發展趨勢、國民黨興衰諸方面產生的影響，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以前的研究多聚焦於

此，見仁見智，爭議也多因此而起。最近幾年，這些方面的研究也有新進展。如蔣與外交的關係，以往的成果側重於蔣與美國、蘇聯、日本等國的關係，肖如平近來以英國的檔案為主體，研究戰時蔣與英國的關係，傅敏以在美國發現的資料為基礎，研究蔣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令人耳目一新。

所謂“私”領域，是指蔣介石作為具體的歷史人物，他的家世與教育、成長經歷、婚姻家庭、宗教信仰、身體狀況等。蔣保存的個人資料之完整，在近代人物中屬於罕見，大量公私函件與長達50餘年的日記的公開，使蔣有可能成為研究那個時代一個極好的個案範本，在社會史、宗教史、身體醫療史、婚姻史上均有意義。對蔣介石“私”領域的研究，是近年來新開拓的方向。在此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與台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連續召開過四次“閉門會議”，分別討論蔣介石的個人生活、人際關係等。筆者將陸續發表過的文章結集成《蔣介石筆下的史實與人物》，2016年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該書也是側重於蔣介石的個人視角。對蔣“私”領域的研究，是深化蔣介石研究必須完成的課題，所涉面也很廣，對學者的要求也更高，如研究他的宗教觀、婚姻觀，研究他的心理與身體等，均需要史學以外的理論與方法。

對蔣“私”領域的研究，所涉主題較寬泛，能減少引起爭議的“敏感性”，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前述兩岸學者的“閉門會議”，參與者局限在小範圍的專家，主題隨意，會議組織靈活方便，省去了許多學術以外的麻煩，非常值得學習與推薦。

3. 拓展國際合作。蔣介石是一個有國際影響的人物，國際史學界有不少學者對其頗為關注，拓展國際合作，學習海外學者的研究角度與方法，可以起到以他山之石“攻玉”的作用，是深化蔣介石研究所必需的。2016年10月28日，由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和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華裔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蔣氏家族與近代中國”工作坊（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Jiang's Family and Modern China）在昆士蘭大學舉行。這是澳大利亞首次舉辦以蔣介石為主題的學術會議，來自中國和澳大利亞的10位學者以及昆士蘭大學歷史系部分研究生參加了會議。澳大利亞學者與研究生提交的“蔣介石與魯迅”、“蔣介石蔣經國和1956年‘雙十’九龍暴動”、“蔣介石與近代城市建設”等論文，都非常有啟發意義。

2013年出版“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叢書”時，筆者曾在“總序”中寫過如下文字：“綜觀學術史，蔣介石相關研究時有曲折。但只要對中華民族有信心，對中國社會一定會進步有信心，就該相信此一研究的價值及前途。”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筆者仍抱持此一看法。

作者簡介：陳紅民，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蔣介石與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杭州 310028

[責任編輯 陳志雄]